

学术专论

晚清社会变迁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

岳 岚

【摘要】19世纪伊始，随着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人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兴起。在晚清一百多年中，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历史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演进。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经历了从严禁到合法的转变，西方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因中国国门的被迫开放不断扩大，学习汉语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汉语教材的数量越来越多，类型日益丰富，编写水平日渐提高。晚清时期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呈现出了新特征。从原始文献入手，勾画这一历史阶段的汉语学习史，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晚清 西方人 汉语学习 汉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17) -02-0122-08

一、引言

大航海以后，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殖民扩张，耶稣会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为了完成宗教使命，他们采取“文化适应”策略，积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使得欧洲语言和汉语相遇并产生相互影响。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为主的耶稣会士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编写了词典、语法书、音韵书等，引发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一次高潮。后来因为“礼仪之争”，导致康熙朝禁教政策的推出。雍正帝更是实施严厉的禁教政策，大规模驱逐传教士，查封教堂，严禁中国人信教。乾隆帝、嘉庆帝也同样严格执行禁教政策，最后，从京城到各地所有的传教活动都遭到全面禁止。传教士作为这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纽带被切断，中西文化交流陷入停滞状态，西方人汉语学习的第一次高潮也随之结束。

18世纪末欧洲宗教改革后，发起了大规模的海外传教活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跟随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的洪流踏入中国。为了宗教传播的需要，传教士急需跨越语言障碍，汉语学习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西方人的第二次汉语学习高潮也因此拉开了帷幕。在这次学习高潮中，学习群体更加庞大；汉语学习成绩更为突出；汉语教材的编写日益成熟，教材类型愈加丰富。在晚清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在中外双方势力消长和中外关系的演变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这个时代的特色，积累下丰富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经验，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岳岚（1973-），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yuelan@bfsu.edu.cn

二、晚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历史演进

18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洪任辉案”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两广总督李侍尧递奏了一份“防范外夷规条”，这一举措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这一政策的核心之一就是制止中外之间的接触。而保障这一核心的法宝之一就是充分利用自然形成的或人为设置的语言障碍”^①。中国近代早期中外交往中的语言障碍，在清朝官员看来是一件好事，有着条规难以达到的效果。语言障碍可以管束、限制夷人自由，钳制夷人言论，阻挡夷人提出非分之想，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因此清政府要巩固语言障碍，并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阻止中国书籍外流，既不让外国人买，也不允许中国人卖给外国人。因为中国官员深深了解，“汉语必须从读中国书籍中学习，特别是从中国的经典中开始入手学，这是谁都知道的一点道理。不仅中国人知道，那些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知道。所以，如果断了中国书籍特别是经典书籍这条来源，汉语也就学不成，起码学不透、学不好”^②。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早期，种种禁令使得当时西方人的汉语学习陷入困境。来华的西方人只能偷偷聘请汉语老师，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初到中国时，不得不晚上学习汉语，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汉语老师。另一方面，学习材料严重匮乏，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汉语知之甚少，借用他山之石充当汉语教材是为首选。

首先，他们会借鉴西方人编纂的现成材料，如把前人的《圣经》章节译本或双语对照本拿来学习汉语。事实上马礼逊在来中国之前，就已借助天主教会的中外文对照稿本四福音书等资料学习汉语了。以《圣经》译本为教材，对传教士的工作有直接的帮助。另外，前人编纂的双语字典也被用来作为汉语教材。马礼逊初到中国时，埃菲斯顿（John F. Elphinstone, Esq.）就赠给他一本价值50英镑的拉丁文—中文字典手稿，直到十几年后马礼逊还常常翻阅。罗伯聃（Thom Robert）还将西方人熟知的文学作品《伊索寓言》译成中文作为学习材料。其次，使用相关中国文献进行汉语学习。马礼逊来中国后，在汉语老师或助手的帮助下，曾使用《康熙字典》进行学习；也有人使用中国蒙学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米怜对《圣谕广训》进行了翻译，用于汉语学习。马礼逊等人还提倡多阅读一些汉文经典作品或文学作品以促进汉语学习，当时有些中国经典已有西方语言的译本。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翻译了中国小说，并附有从中国经典和其他书籍中搜集的谚语和道德格言。另外，汉字圈内其他国家的语言学习材料，也被他们拿来为我所用。麦都思（Medhurst Walter Henry）把汉语、朝鲜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对照的词汇表《朝鲜伟国字汇》添加上英语翻译，以方便西方人学习。这些学习材料虽对汉语学习有所帮助，但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要想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还需要自己动手编写教材。

伦敦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伦敦会交给他的两大任务是翻译《圣经》和编写一部字典，这两项任务的完成都以掌握汉语为基础。马礼逊来华后就开始边学习汉语边为完成两大任务做准备，他在自己学习汉语的艰难过程中，也在考虑如何为后来者的汉语学习提供帮助和方便，因此开始了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起初，马礼逊翻译了中国蒙学课本和其他汉文材料作为教学资料。为了帮助他的英国同胞，他编纂了一本汉文文书《通用汉言之法》^③；针对日常口语的学习，他编写了《汉语对话和散句》^④。更为著名的是1815—

①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② 季压西、陈伟民著：《中国近代通事》，第78页。

③ Robert Morrison: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Serampore;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15.

④ Robert Morrison: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6.

1823 年间马礼逊三卷本《字典》^① 的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印刷出版的汉英英汉双语字典。当时，广州作为商业贸易中心，可以允许外国人进入。在广州生活的外国人就有了学习广东方言的需求，马礼逊为此于 1828 年编写了《广东省土话字汇》^②。美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于 1830 年抵达广州，在那里他认识了马礼逊，并在汉语学习方面得到了后者很大的帮助。裨治文同样翻译出版了中国儿童蒙学课本《三字经》和《千字文》等以方便汉语学习，也因居住在广州而编写了广东话汉语教材^③。

1840 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结果是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致使香港被割让，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口岸被迫开放，并允许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居住、活动。《望厦条约》第十八款还特别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得外国人扩大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而且为他们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这 20 年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新秩序的第一阶段”^④。

外国人的活动范围从广东、澳门等扩大到广州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地区。传教士为了在各地传教工作和生活的便利，编写了涉及潮州、广东、宁波、福建、厦门等五个地域的方言教材，比第一时期限于广东和澳门地区的方言学习扩大了不少。这一时期的方言教材包括综合教材、语法教材、阅读教材、词汇和词典，主要涉及广东方言、宁波方言和上海方言。

通商口岸的开放，贸易往来的需求促成了更多涉及商贸内容汉语教材的编写和发行。麦都思的教材晚于马礼逊的口语教材 26 年，这期间商业往来有了进一步发展，麦都思根据时代变化增添了商贸方面的内容，如增加了商业规则和关税的介绍，为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提供有用的词语和观点，还增加了各种商店的名称。这些变化迎合了学习对象的实际需求，大大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医馆的设立也催生了合信 (Hobson Benjamin)《医学英华字释》^⑤ 的出版，该书还将西医中的一些词语引入汉语，在外来词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领事馆在五个通商口岸的设立和官员之间的往来，促进了官话的学习。身为外交官的罗伯聃将中文著作《正音撮要》翻译为官话汉语教材 *The Chinese Speaker*，他十分注重官话发音，该书节选《红楼梦》和《家宝全集》的内容，目的是为学习者提供能学到正宗的北京官话的素材。同为外交人员的威妥玛 (T. F. Wade) 也致力于官话教材的编写，《寻津录》和配套教材《北京语音》^⑥ 就此产生。值得一提的是，《习汉英合话》^⑦ 一书既为美国传教士来中国提供汉语学习的帮助，也为已经移民并且即将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的学习英语提供方便，是一本“双向”教材。该书在海外印刷，也出口到中国，为来华传教士所用。这种教材的出现开创了汉语教材编写和发行的新模式。

①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 Press, 1815 - 1823.

② Robert Morrison: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Printed at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③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China: Printed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1839;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39; 1841.

④ 费正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06 页。

⑤ Hobson Benjamin: *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58.

⑥ T. F. Wade: *The Peking Syllabary*, Hongkong: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A MAIL", 1859.

⑦ Stanislas Hermisz: *A Guide to Conversation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Boston: Published by John P. Jewett & Co. Cleveland (Ohio), Jewett, Proctor and Worthington. London: Trunber & Co., 1854.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增开了天津等 11 个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在这些地方生活、自由传教、经商，并且允准各国大臣遇有要事，不论何时均可到北京暂住。《天津条约》第二十五款还特别重申“大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请系何等之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篇。”“在《天津条约》中，中方作出了外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就一直想得到的大多数重大让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英条约中措辞谨慎的‘向京城派驻外交使节’的权利，这一条款被额尔金认为是‘通过条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此外，所有的条约都赋予外国人在内河航行以及在中国城镇建造住所的权利，因此大大开放了中国的内陆地区。在外国人看来，进入北京和开放内陆这两大让步，是新条约的关键所在，他们相信这必然会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带入一个新纪元”。^①《中美天津条约》中另一条对传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条款是“基督教传教士有权利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传播我主耶稣基督的教义”，这是中国前所未有地向基督教传教活动开放的条款。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 30 年中，通商口岸的租界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地域：它们对整个中国有着日益扩大的影响^②。

随着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大，方言教材数量增加，涉及的方言种类也增至十几种，不过，仍以广东话方言教材为最，另外还有上海方言、宁波方言、福州方言、厦门方言、汕头方言、潮州方言等教材。这一时期也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出现了更多的方言字典。

1858 年，英国公使馆在北京成立。随着外交使节进入北京，西方人对官话的学习需求更为迫切，他们的官话学习也逐渐从南京官话转向了北京官话。“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③再加上英国驻华领事官员的录用和任命制度的逐渐完善，即自 1861 年起，各级领事官员需经考试择优录取，被录取的考生即转为驻华公使馆翻译学生，然后需经两年的汉语学习后方可任命上岗，这一制度极大地促进了驻华外交官学习汉语的积极性。英国外交官威妥玛编写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北京官话教材《语言自述集》即是一本为翻译学生编写的汉语教材。其他类型的官话教材还包括：以话题为纲进行编排的口语教材、注重结构的语法教材、为旅行者和商人服务的官话方言兼顾的教材、词汇双语对照教材以及旨在同时促进北京官话和英语学习的双向教材。

因为英国军事占领了缅甸，使得他们的“边界”与中国西南边界有了接壤，在他们的居民和军人之间创造了对汉语知识的广泛需求。同时由于几乎所有的汉语著作都在中国出版，一方面在英国使用到这些书的时间会大大延迟并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费用也高；另一方面书籍印刷的形状和尺寸不方便旅行者和战士携带；此外，《语言自述集》等汉语教材是为长期住在中国的学生设计的，对英国本土的学生而言并不适用。有鉴于此，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编写了《华语鉴》^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开始出现书面语汉语教材。作为外交官，工作中和中方书面往来是不可缺少的，书面汉语也是外交人员的必备武器。威妥玛在口语教材《语言自述集》之外，还专为外交官的书面语学习编写了《文件自述集》^⑤，该书由 75 篇应用文组成，不仅是实用

① 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312—313 页。

②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206 页。

③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述集——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4 页。

④ Robert K. Douglas: *A Chinese Manual*, London: W. H. Allen, 1889.

⑤ T. F. Wade: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second edition, Shanghai-Hongkong-Singapore-Vokohama: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05.

性强的汉语教材，也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其配套教材《文件自述集答案》^①是对《文件自述集》汉文文本的翻译和注释。此外，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Friedrich Hirth）也结合自己的海关工作，编写了书面语教材《海关文件录》^②和《文件字句入门》^③。伴随书面语教学的开展，还出现了针对性很强的工具书《文件小字典》^④，该字典也是由赫德编写的。

汉字是西方人汉语学习上的一个很大障碍，随着汉语学习的深入，汉字专项教材应运而生。这些汉字教材有的侧重汉字结构分析，有的旨在帮助学生辨析形近字，有的侧重汉字书写，总之是针对学习者不同需求和学习难点编写的侧重点各异的汉字教材，这是这一时期汉语教材编写中出现的一个新特征。同时工具书也比较多，其中包括方言字典。William Scarborough认为谚语对于学习语言和想了解中国的人都是有用的。他把自己搜集的谚语编辑成册^⑤，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传统的汉语语法书编写一如从前，数量却不多，但这些语法书难脱窠臼，仍在印欧语法的框架下进行分析，不过增添了一些具有汉语特征的描述与分析。

19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战争的失利使得清政府在经济上和主权上都受到挫伤，《马关条约》的签订还使得外国商人在中国设厂合法化。“1902至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家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通商口岸由1899年的45个增至1911年的82个，并在其中的16个城市设立了‘租界’。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由1901年的1102家增至1912年的2328家，垄断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⑥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有“得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区，洋行、银行、外国工厂鳞次栉比，出现了殖民经济的繁荣。“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的20年代中，主要通过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像滚滚洪流，它大大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在这一时期，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外国人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⑦。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在北京设立“使馆区”，来华外交人员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另外，新教传教士来华人数也在迅速增加，“1899年新教在华传教士仅有1296人，到了1906年则增至3883人，1919年达到6636人，30年中增加5倍多。这些传教士驻扎在各省的693个地方，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⑧。布道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云南、蒙古、黑龙江等边疆地区。此外，20世纪初，新教差会来华数量增长也很快，并且在华差会还注重联合布道工作，使得基督教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进步。

无论是商人、外交人员还是传教士，各类外国人在华的各种活动都达到了高潮，这也间接反射到他们的汉语学习上：这一阶段所使用的汉语教材（包括再版教材）数量迅猛增长，达到整个晚清时期的顶峰。

随着生活、工作的深入，官话学习越来越有市场，这个时期出现了多次再版的官话教材，其

① *Key to TZU ERH CHI, Documentary Series*, 1867; Shanghai - Hongkong-Singapore-Yokohama: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1905.

② F. Hirth: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hanghai: Published at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5.

③ F. Hirth: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Kelly & Walsh, limited: Shanghai, Hongkong, Yokohama, and Singapore, 1888.

④ F. Hirth: *A Vocabulary of the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8.

⑤ William Scarborough: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⑥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1849—1919》，中华书局，1994年，第299页。

⑦ 《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6页。

⑧ 姚伟钧、胡俊修主编：《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狄考文 (C. W. Mateer) 的《官话类编》^①。初版于 1907 年, 由英国外交官禧在明 (Walter Hillier) 编写的《华英文义津逮》^② 也很受欢迎, 直到 1942 年还有该书的第十版出版。另外还有西部官话教材、北京官话教材等。19 世纪后期开始, 除了外交、海关等专门领域工作的西方人以外, 普通大众对书面语的学习也有了需求。T. L. Bullock 编写的《汉语书面语渐进教程》^③ 就是这种需求的产物。

官话教材的广泛使用, 并未取代方言教材的位置, 从绝对数量和方言种类而言, 这一时期的方言教材为四个时期之最, 包括广东方言、上海方言、厦门方言、宁波方言、温州方言、客家方言、金华方言、顺德方言、福州方言等多种方言。多种官话教材、多类型教材和更多方言种类教材的出现也反过来说明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的活跃程度和空前的活动范围。和上一阶段相比, 方言教材遍布范围更广, 涉及方言种类更多, 广东方言教材的绝对优势在削弱, 和上海方言教材旗鼓相当。方言教材的变化和外国人在华的活动范围密切相关。随着生活的深入, 方言教材的编写质量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 双语对照的词汇书几乎不见了, 出现了专门的方言语音教材和方言阅读教材, 教材的精细化发展也体现了汉语学习的深入。译自中国人编写的《成语考》^④ 教材的出现, 表明学习者对汉语特色词语的重视, 也说明他们对汉语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同前一阶段一样, 这一时期汉字学习颇受重视。汉字教材主要有: 《官话萃珍》^⑤ 是美国人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在个人学习和积累基础之上的成果; 《字部新法》^⑥ 以非常简短的篇幅展示了 80 个字中的部首、次部 (sub-radicals) 和余画 (the remaining strokes), 之后还设有练习; 《汉字举例》(Selected Lis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则是按照字频安排的汉字表, 这些表格源于中国打字机轮子上的汉字安排。汉字表中共有 4662 个汉字, 其中非常常用的 726 个; 常用的 1386 个; 不太常用的 2550 个。

在词典中, 名气较大的当属翟理斯达法 (H. A. Giles) 的《汉英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编写这本字典的初衷是为了给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提供便利, 因此收集了尽可能多的地道的汉语表达。这本字典的附录中还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内容, 这个做法也同样出于帮助汉语学习的目的。该字典最大的成绩是修正了威妥玛的拼音系统, 使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得以确立。让人惊喜的是, 科技词语典 (Technical Terms English and Chinese) 的出现和成语词典《英华成语合璧字集》^⑦ 以及一本专业领域的词汇教材《海关语言必须》^⑧ 的产生。另外还有专门针对学生使用的小型词典《学生四千字袖珍字典》(The Student's Four Thousand and General Pocket Dictionary), 这是汉语教学的进步, 也为学生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更大便利。

晚清时期的后 20 年 Characters 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达到高潮, 教材数量、类型和编写水平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繁荣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是衰落。晚清之后, 汉语学习和外国人的活动仍然很活

① C. W. Mateer: *A Course of Mandarin Courses, Based on Idioms*, 1898. 该书初版于 1892 年, 后来多次再版, 目前笔者看到的还有 1898 年、1900 年、1903 年、1906 年、1907 年、1916 年、1922 年再版的版本。

② Walter Hillie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London: Kegan Paul, 1907.

③ T. L. Bullock: *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 London: Sampson Low, 1902.

④ J. H. Stewart Lockhart: *A Manual of Chinese Quotations*, Hongkong: Kelly & Walsh, Limited and at Shanghai, Yokohama, Singapore, 1893.

⑤ Chauncey Goodrich: *A Character Study in Mandarin Colloquial*, second edition,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6.

⑥ 作者不详, *Explanation of the Use of the Sub-radical*,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3.

⑦ D. Macgillivray: *A Mandarin-Romaniz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5.

⑧ C. A. S. Williams: *An Anglo-Chinese Glossary for Customs and Commercial Use*, 1908. Revised Editio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1914.

跃，但由于进入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内容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

三、晚清时期西方人汉语学习的主要特点

汉语学习者亦为教材编写者。在中西初识阶段，西方人的汉语学习也刚起步，没有现成的汉语教材，他们只能自己编纂。因此，晚清时期的汉语学习者也同时是汉语教材的编写者，这样一来，在教材编写时，他们大多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能结合自身学习中的难点，编写的教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在内容的编排上，传教士所编写的教材有更多宗教内容的融入，例如，有不少来自《圣经》的例句、短文，也有选自中国经典，但都是与《圣经》所倡导的观念一致的例句或文章。他们也根据自己在汉语学习中的弱点和难点进行重点讲解，比如，汉字和声调等内容。当然，因西方人汉语水平所限，很多教材都是在中国老师或助手的帮助下完成的，这开创了中外合作编写教材的模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

教材类型丰富，借鉴东西方成果。19世纪初期，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环境比较恶劣，在没有现成教材借鉴的情况下，只能自己动手编写。因对汉语知之甚少，而且缺乏学习积累和教学经验，故所编教材比较简单粗糙。在语法书中，他们大多机械套用印欧语法，采用欧洲语言中的时、体、态来分析汉语语法，对汉语进行八大词类的划分等等，难免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不过，随着对汉语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他们对汉语特点的把握也越来越到位，对汉语声调、送气音、成语、量词、语气词、处置式等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在教学方法上他们借鉴同时期西方的奥林多夫（Ollendörf）教学法、安（Ahn）教学法、古安（Gouin）系列教学法等进行汉语教学。同时他们也吸纳中国语言学的成果，特别是对汉字理论、音韵学知识的借鉴。汉字对于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文字，而中国的文字学研究则历史悠久，借鉴关于汉字的起源、构造、书写等等相关的文字学成果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照搬中国的传统说法，而是从他者的视角，从汉语学习和使用的角度进行说明。双语字典和双语对照词汇书是西方人汉语学习的又一产物，这一方面与18世纪西方人因语言调查和搜集语言样品所编写词汇双语或多语言对照书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早期汉语教材匮乏相关，特别是初到方言区的西方人，不得不搜集和积累一些日常词汇或短语，并用母语加以注释说明，而后编辑成书，供自己和后人使用。方言教材涉及的区域广泛，编写水平良莠不齐，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广东、上海等地的方言教材数量较多，水平相对较高。

注重实用性。晚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人肩负着明确的使命，或传教或外交或经商，他们的汉语学习有着强烈的目的性，汉语作为他们展开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工具，必须能够学以致用。这首先要要求汉语教材的内容符合他们的实际需求。教材内容一般涉及日常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以及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主题。其次则是语料真实、鲜活。晚清时期的多数教材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积累才印刷出版的。比如，一些口语教材的作者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选用的每个例句都是出自中国人之口，是活生生的生活用语。此外，还有一些注重实用性的策划和设计，例如：《华英联珠分类集成》每一课的篇幅都在一页内，中英文对应排列，方便学习者使用。鲍康宁把西方人学习难点之一量词汇编成册后印刷。即便是教材印刷的形状和尺寸也会在编写者的考虑范围内。《华语鉴》一书为了方便旅行者和战士携带，还改变了书本的常规规格。

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结合。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马礼逊十分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习惯以及当地的风俗和观点不甚了解，相应地，他很难理解那个国家的语言。同时在应用那个国家的文字和语法时，就会出现错误”^①。马礼逊的这一观点直到现在仍然适用，对于晚清时期的西方人来说尤为必要。马礼逊在他编写的教材中，常编入与语言点相关的文化信息，课文注释中也包含对中国文化的说明。他编

^① 谭树林：《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写的三卷本字典，被视为一部百科全书，字典中既有对佛教、道教等宗教中的思想观念的介绍，也有对神话传说、小说、戏剧等文学内容的解释；既有对中国礼仪风俗的引介，又有对中国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的点评；既有对中国科学知识的设计，也有对中国名人的描述；既有对中国特有事物的介绍，也有中西文化的对比。这样做，一方面，学生可以更清晰地知晓字义，另一方面，从中可以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为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和在中国的生活、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另外，他单独发行的《中国概览》、裨治文的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John Fryer 的 *China and Chinese* 等为学习者提供了全景式的中国文化图景。无论是他们编写的文化教材，还是字典、口语教材、综合教材等等，都十分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现象，涉及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礼仪文化、精神文化等内容，充分体现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References

Chen Shanshan. “Yuyan Zierji dui Riben Mingzhi shiqi Zhongguoyu jiaokeshu de yingxiang” (The Influence of *Yuyan Zierji* on Chinese Textbooks during Meiji Period of Japan), *Jilin Daxue Shehui Kexue Xuebao*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9. 2) 2009.

Fei zhengqing (John K. Fairbank) et al. eds. *Jianqiao Zhongguo Wanqing shi, 1800-1911* (shangxia Jua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0 Late Ch'ing, 1800 – 1911, Part I & II).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5.

Ji Yaxi & Chen Weimin.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Chinese Modern Translators).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2007.

Li Kan etc. *Zhongguo jindaishi: 1840 – 1919* (Chinese Modern History: 1840 – 1919).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4.

Mi lian (Milne, William). *Xinjiao zaihua chuanjiao qianshinian huigu*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Overseas Sinology a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ranslated.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08.

Tan Shulin. *Malixun yu zhongxi wenhua jiaoliu* (Robert Morrison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Hangzhou: Zhongguo meishu xueyuan chubanshe, 2003.

Wei tuoma (Thomas Francis Wade). *Yuyan Zierji—19 shiji zhongqi de beijinghua* (Yuyan Zierji—the Beijing Dialect in Middle 19th Century), Zhang Weidong Translated.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2.

Yao Weijun & Hu Junxiu eds. *Jidujiao yu 20 shiji Zhongguo shehui*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Society in 20th Century).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4.

The Social Changes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and Westerners' Chinese Study

YUE L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yuelan@bfsu.edu.c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and initiated the second tide of Western Chines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evolved with modern Chinese social changes. Western studies of Chinese went from forbidden to legal status. Because China was forced to open in the late Qing, the scope of Western activities was broadene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learning Chinese raised, with the result of an increase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rich types of textbooks and improved levels of 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new features of learning Chinese appeared. Based on the primary mate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arni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in this period. This is essential to the disciplin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also a crucial portion of interchange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